

康洪伟 著

永远的开始

• 明天出版社

永远的开始

康洪伟 著

明天出版社

1993·济南

鲁新登字06号

永远的开始

康洪伟 著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6开本 8.125印张 2插页 145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2

ISBN 7—5332—1653—9

I· 346 定价：3.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3
第三章	115
第四章	175
第五章	239

第一章

1963年不比现在，那个时候全国都困难，于是我先天营养不良。

记得有一次我得病，那时我好像刚一周岁。说一周岁的孩子会记事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可我至今仍然有那么个印象，或叫感觉。还说我得病的事儿。当时我不吃药，急坏了我妈。她喝令长着一双大眼睛的二哥去买白糖。二哥那年才不过七八岁。二哥拿起一个破旧的黑色人造革兜子戴上软塌塌的帽子迎着东北春天的大风顺着房子的拐角向商店跑去。风一次次把他的帽子掀起，他不得不一次次把它压下。而他仍然是跑去了。去了好久，二哥怯生生地拎着空兜回来了，妈妈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后来我还是吃了药，病自然好了。我说这件事就是说明我们小的时候连白糖都吃不上。尽管这样，我还是长大了。我记不清自己长得什么样了，可后来据别人说当时我很漂亮。妈妈总共生了四个淘气的

男孩，自然无法个个顾得过来。我经常溜出去玩，我家旁边有一个工厂，那厂子生产钢板，就是那种一卷高过一人的钢板，我常常跑到一卷卷钢板的空心里玩耍。有一天我正玩得高兴，突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声，有人喊马惊了。我探出头来，看到一匹枣红色大马正扬鬃摆尾地向我跑来。我毫不畏惧地向它冲去，挥着手，嘴里还喊着什么，喊的是什么我记不得了。四周的人见了都惊呆了，心软的已经把脸转了过去。结果是我没拦住马，马也没伤着我。马是从我头上飞奔过去的。神就神在我连一根毫毛都没损伤，只是扬起的尘土塞满了我的喉咙。我从尘土中爬起来，冲着马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骂了声他妈的。

那一年我五岁。

等我摇摇摆摆地回到家中，妈妈红了眼睛把我抱在怀里。过了一会儿又把我拉转身，在我鲜嫩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恨恨地看着妈妈。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隔壁的王大娘听到声响过来一把拉过我去。我似乎看到了屁股上的五个红手印。可我没有哭。

过了不久，武斗开始了。我们全家都不出门，用毡子挡上窗户，地上放一个便盆。每次小便我都浇得很响亮，于是想出去看看太阳。有一次我忍不

住爬到房顶上去拣子弹头，立刻就有武斗勇士向我开火，可他枪法不灵，让我多拣了子弹头。后来爸爸进了牛棚。那牛棚是专为走资派现搭的棚子，只有地基，旁边都是用席子钉的。我时常跟妈妈去给爸爸送饭，我每次都可以吃到爸爸饭盒里的炒鸡蛋。有一次爸爸笑哈哈地接过饭盒，刚打开盖，就有一个带红袖标的专政队员走过来说：

“嗬，你还剥削人哪！”

爸爸冲他笑笑没说什么。妈妈毫不客气：

“你这人狗逮耗子，多管闲事。”

那个专政队员居然笑了。后来这个人的儿子和我是同学，而且一直对我很好，这是后话。等那专政队员走后，旁边一个“走资派”叔叔胆战心惊地对妈妈说：

“你好大胆子……”

后来这位叔叔跳楼自杀了，他女人也改嫁了，两个女儿也改了姓。

爸爸后来给放出来了，可批斗每场必到。其实爸爸不过是工厂工会的秘书而已，怎么算得上走资派呢？有一天，爸爸挨批斗回来，按照造反派的命令把带有划了红叉的名字的大牌子带回家里。一进门爸爸就笑哈哈地把牌子翻了过来。妈妈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

爸爸有一位多年的老同志，也是多年的老邻居。爸爸同他在几个城市一起工作过，最后一直到了这里。我叫他刘大爷。到了1969年底，走资派走上了光辉的“五·七”道路。刘大娘有11个孩子，她还能腾出手来每年养一头猪。每到过年时，刘大娘总会来叫上我们全家去吃猪肉和猪血肠，而我家通常又只是爸爸妈妈去。妈妈实际上是陪爸爸去的，因为他们刚到刘大娘家一会儿，她就得回来给我们做饭。可这一年不同了，因为都在张罗着下乡，刘大娘一怒之下提前杀了猪，还亲自带了大姑娘和二姑娘上门非请我们全家不可。就这样我趴在二姐姐的背上来到了刘大娘家。刘大娘家的大炕上专门为我們几个小孩放了一个黑糊糊的小桌子。刘大娘里里外外地吆喝着，让我们多吃多喝，我靠在二姐姐的怀里一口一口地吃着猪血肠。我实在是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爸爸每月80元的工资，一家六口人不算，还要寄钱买东西给奶奶家，实在是不敢奢侈。现在想来，妈妈是怎么支撑过来的呢？我一口吮一段血肠不知吃了多少，可那血肠皮就是肠衣我实在咬不动，就偷偷把它扔在桌子下。二姐姐发现这个秘密后使劲地亲我，夸我真乖，于是我就更乖起来了。那天的饭还没吃完，就听到门口有脚步声。进来的人中为首的一个叫刘景山，是个造反派的头

头。他原来是个不爱干活的学徒工，有事没事总打着他瘫妈妈的幌子到厂工会摇尾乞怜地要困难补助。现在可今非昔比了，他已经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个军代表。刘景山一进来就冷冷地打量着全屋人，不发一言。刘大爷曾是工会主席，可今天在革委会副主任面前也不免有些气短了。

“刘主任，啊，刘主任……”

可刘大娘不管那一套，她本来就是黑龙江大荒甸子上长大的村姑，大不了还回到荒甸去。她还大声吆喝吃他娘的。可妈妈有些受不了了。本来妈妈早年受过丧子的刺激，又加上父亲几次政治运动中受挫，精神实在是超负荷了。妈妈一看到这些人进来，手一抖丢下了筷子。刘大娘看了一眼屋子里的人大声说道：

“看什么猴？吃呀，又不收钱！”

她转身又拿起一双筷子用手抹了一下塞到妈妈手里：

“妹子，吃！”

说罢她带头夹起一块肥肉颤微微地送到嘴里，仔细地嚼烂又在嘴里转了个圈，然后把胖乎乎的脸仰起来，向上翻了一下不大的三角眼睛，伸长脖拉长声调说了一句我记了二十多年的话：

“肉大满——口——香——啊——”

刘景山为了表示不和家庭妇女一般见识，便皱了皱眉头直呼刘大爷和爸爸的名字说：

“一会儿我再单独和你们谈谈。”

刘大娘看着他转过身来，呸了一声说：

“怎么这肉有股粪味。”

这顿饭自然是没吃好。刘大娘送妈妈回家，她一边走一边对妈妈说：

“妹子，别怕，咱们一起下乡，再做回邻居。养点小鸡，种点菜，神仙似的。”

爸爸在旁边默默地陪着。等回到家里，爸爸扯过被子给妈妈盖好。然后拉过刘大娘轻声说：

“大嫂子，你陪她一会儿。”

爸爸去见刘景山，我悄悄跟了出去。

再回到刘大爷家，气氛与刚才就不一样了。刘家的孩子收拾好了碗筷躲进另一间小屋子里偷偷向外张望。刘景山指手划脚地说着什么。

我躲在门后听到一点，原来说要我们两家下乡插队，三天后就动身，为的是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生日献礼。他强调这是政治任务。刘大爷和我爸爸面面相觑。最后爸爸说话了：

“下乡行，我们服从党的安排。只是想……我们两家到一个地方去。”

刘景山手一劈喝道：

“别做梦了！你们俩下到一处去？再走资本主义道路哇？休想！告诉你们，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俩在不同的县，三天后派车来送你们。看在伟大领袖寿辰的面子上，哼，就这么定了！”

说罢他大步流星走出去。对了，他还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就这样我们全家准备下乡了。家里人里里外外地用草绳子捆破箱子。妈妈眼睛发直地躺在炕上。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那一捆捆满是草屑的绳子。一切终于在两天内准备就绪。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穿的盖的和随手用的罢了。那天晚上挺有意思，造反派们郑重其事地为走资派们送行，还开了个欢送会。那个腆着肚子的军代表主任讲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只觉得他的秃顶很好玩。最后还奏了乐，这群走资派们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低眉顺眼地上前接受红语录本和毛选四卷，每个人的胸前还戴上了红花。激动的掌声响了起来。然后放电影《列宁在1918年》。我只记得那里边的人总是上下楼梯，一点也不好看。我便闹着回家。回到家里一看，所有的东西已经齐整地捆好放在地上了。妈妈围着件破黑大衣，呆呆地坐在炕上。我怔怔地走过去，妈妈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爸

爸拉过我，对两个哥哥说，就穿衣服睡吧，明天一早就走了。这个时候我大哥已经插队去了，他是老三届的初一学生。刚刚十四岁就在1968年第一批上山下乡去了。爸爸把灯关上了，一家人在黑糊糊的夜里，各自找了块地方，也没有脱衣服就躺下了。外面有雪，反射进来的白光使屋子里的东西映出许多怪影来。我望着那些怪影出神，幻想那怪影里有人，最好是刘景山；我则高高大大的，手里还有一枝枪。当刘景山张牙舞爪地扑过来时，我睁大眼睛一枪接一枪地打在他的脑袋和身上各个部位，我那枝枪里的子弹最好是永远用不完的，就这样一直打下去，直到把他打成筛子。后来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真留恋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尤其是那些小女孩们，特别是小萍。小萍的爸爸是大夫，是个强奸过女患者的大夫，于是小萍妈妈便同他离了婚，可小萍妈还常来看小萍和小萍爸爸。大人的事真弄不明白。这样小萍便成了小孩子中的受气包。可我喜欢她，因为她总是干干净净的。她黑而柔软的头发上总是有各种鲜艳的头绫子。她喜欢花，可她家又不种花养花，我便常常从我家后院大簇的芨芨草中摘下大把大把的花，再用那红的或粉红的花瓣为她染指甲。摸着她白白胖胖

的小手我便不愿放开，结果是我的手指比她的指甲还红。其它的那些女孩我也喜欢。最可气的是小丽，她爸爸原来是个部队的指导员，因为有一次给连长递墨水，不小心在雪白的石膏领袖像上溅了小米粒大的两点墨水，这下子他倒了霉，就这样到爸爸的厂子里当工人。有一天他喝多了酒一个人靠在门旁敞着胸大声喘气，我把手里的半根冰棍塞进他嘴里，他眼睛红红地看着我，突然吼出一声：“唉，苦哇。”还说小丽。小丽是个野而漂亮的小女孩。她看我站着撒尿，她也站着撒，可撒出的尿溅她满裤子。小丽虽然野，可她变着法给我好东西吃，总想借此哄住我。她一看到我和小萍在一起就拉我走，而且恶毒地连声喊“强奸犯”。小萍这时候总是捂着脸哭着跑开。有一次我看不过去就恶狠狠地把一大口唾沫吐在小丽脸上，看着那粘糊糊的东西从小丽怔怔的脸上往下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痛快之后我又抓起一把土扬在小丽的脸上，雄赳赳地走了。小丽的哭声很高很大。

我孤零零地走出房门。早上的太阳还没出来，满世界是银白和清冷，汽车还没来。满地的白雪，脚踩上去吱吱地很好听。我心里真难受，因为要离开这里还不知能不能回来。这时我看到远处电线杆子下有个桔黄色的身影，小小的。那个小身影缓缓

地向我这边走来。是小萍。她的小脸冻得红红的，一双小手插进小棉猴的口袋里。她一步步地走到我面前，歪着头看我，我也怔怔地看着她，一片片雪花在我们之间飘落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小萍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递给我一副黑毛线的小手套，是那种四个手指连在一起的手套。望着她的眼睛，又望望那手套，我一动没动。她就这样举了好一会儿，我还是没有接。这时有一个声音叫道：

“小萍，这么早你跑出去干什么呀？快回来！”

是那强奸犯爸爸。小萍最后看了我一眼，突然把手套扔在地上转身跑开了。我的手仍然插在大哥小时候穿过的旧棉猴口袋里，看着雪地上那两只手套。我觉得那是两只眼睛，两只黑黑的大眼睛。

我慢慢地转过身，走了。

按照要求，我们全家走的时候都戴上了红花。我呆呆地把胸前的那朵花一瓣瓣地撕下来在手里揉着，扔在雪地上。直到爸爸拉我的时候。我才钻进汽车驾驶室。我刚一进去，就有一只手抓住我，是小丽。她把一枝黑油油的大木头手枪递给我说：

“这是我让爸爸给你做的。”

她的酒鬼爸爸站在她身后。我握着枪柄，粘糊糊的，漆还没干。小丽的爸爸正冲我笑呢。我从来

没见他这么和蔼过。等车一开，小丽就“哇”地一声哭出来了。那哭声随汽车跑出了好一段。等我回头的时候，却看到一个桔黄色的身影孤单单地站在那根电线杆子下。

是小萍。

可能从那时开始就注定我的生活是颠簸，而且总是搅在两个不同性格的女孩子之中。这是后话。

那一天是1969年12月26日。

那一天的雪真大，没了半个汽车轮胎。爸爸为了照顾妈妈，坐大车走了。十六岁的二哥照顾七岁的我。我们上路了。等到汽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时，车下围了一些大人和小孩。其中有一个没了半个耳朵和半边头发，那疤光亮亮的。他带头举起拳头高呼：

“热烈欢迎革命干部插队落户走光辉的‘五·七’道路！”

连喊了几遍，便没有什么可喊的了。于是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在这稀稀落落的欢迎声中，我同全家下了车。那个“半拉瓢”走上前来说：

“我是光明三队的队长。我代表三队的全体贫下中农欢迎你们。”

爸爸仍然那么潇洒，他握握“半拉瓢”的手说：

“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妈妈苦着脸看那两间茅草房。“半拉瓢”走过去：

“恭请这位女同志到屋里歇着。”

也许妈妈许久没有听到这种尊称了，脸上似乎有了一点笑容。我们全家进了屋。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外号叫“韩大埋汰”的司机正伏在方向盘上笑呢。

那间茅草屋的墙壁雪白雪白的，是霜。那屋里飘着烟。我们一进屋，一个麻脸结巴老太太连忙站起来：

“来……来……来得这……这么快，炕……热了，可烟……烟……烟……”

“半拉瓢”笑嘻嘻地顺手捏了她一把。“麻脸”拍了他的疤一下说：

“该死……死……的。”

外面的贫下中农们已经开始卸车了。

直到车卸完了，爸爸才满身灰尘地回来了。原来他到房后看到了场院，便帮助扬起场来。好几个大拇指竖了起来。“半拉瓢”的嘴咧得很大。

第一顿饭是生产队招待的。大黄米饭，酸菜汤里有些肥肉片子。这是本地最好的饭菜了。司机“韩大埋汰”甩开腮帮子连汤带饭吃了不知有多少，汗

淌下来了。别的人在他的鼓舞下，都起劲地吃，终于都冒了汗。

那三年多的农村生活几乎是我全部童年的记忆。春天来临了，一簇簇的柳毛子发黄发绿，地里的野菜野草漫山遍野；夏天时踩着门前小河里的沙泥堵截小鱼；秋天时随放牛人跑到山上烧黄豆或是到水塘里串青蛙；冬天来了，到山坡上滑雪爬犁。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读书了。书是从集体户转过来的大哥带来的。这些书全是“文革”中大哥和他的同学们从图书馆偷的。我看的第一本书是《红旗谱》，后来便是《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之类的“毒草”。刚刚8岁的孩子自然有许多字认不出，不过这不会影响我在煤油灯下熏黑鼻孔。这一切为我后来上大学中文系时省了许多读小说的时间，那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说是《多浪河边》了。在那三八大盖、大刀的刀光剑影、血光闪闪、特务、日本鬼子汉奸的气氛之中，领略到牧群、草地、冰山、葡萄藤的美妙境界，再加上哈得尔和阿娜尔汗那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真让我入迷，入迷到一生爱书的父亲只好用摔书来阻止我看书了。因为我不分时间地点光线，抓住书就看。爸爸实在怕我再像他那样戴上眼镜，可到底我还是戴上了眼镜。16年后，我见到来自《多浪河边》作者身边的